



迈向经典

——《一个人的长征》再认识

□ 刘 飞

“大步走来喂是喂——”8月17日，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再度登上中央歌剧院剧场舞台，第三次唱响京城，献礼建党105周年。婉转悠扬的牡丹调、意趣横生的矮子步，“一个人的长征”演绎出乡土草根荡气回肠的坚守与抉择。这是个体的长征，亦是时代的长征、民族的长征，更铺展着乡土戏曲自信成长的漫漫长路。在这极具象征意义的红色寓言中，主角的矮子步，踏出厚重的使命担当，融汇成扎根乡土、拥抱现代的独特艺术表达。一部文艺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从来不是仅凭题材热度、舞台规模、奖项荣誉，还在于创作者是否秉持清醒的经典意识。何为经典意识？就是跳出任务叙事、流量叙事、标签化叙事的套路，牢牢抓住戏剧“人学”核心，赋予作品长久的生命力与丰富的阐释空间，推动思想内核、叙事文本、舞台表达同向奔赴。《一个人的长征》的声名日隆，正是得益于此，它为当代戏曲现代戏创作，开拓了全新的审美向度与思考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苏区干部刘启耀，当年一路乞讨只为保护、归还组织公款，正是本剧的人物原型。《一个人的长征》将叙事焦点聚焦于赣南普通马夫骡子，全剧七场结构严丝合缝、节奏张弛有度，人物成长脉络清晰自然。主人公骡子的核心行动，是完成“为红军归还金子”的承诺。寻红军、赶路途的漫漫长路上，他颠沛流离，历经生死考验，内心始终挣扎、始终摇摆，支撑他踏过万难的，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深处的重信守诺，一份刻在乡土骨子里的道义担当。他被红军的理想与精神深深感召，完成自我的成长，从单纯兑现诺言的普通人，自觉走上与红军同向同行的长征之路，淬炼出纯粹厚重的生命价值。充满戏剧张力的情节、略带夸张的故事架构、性格鲜明执拗的人物形象，构筑起一则极具寓言色彩的舞台叙事。这一独特的戏剧表达，打破了长征题材固有的叙事框架，让红色故事焕发出全新面貌，也精准拿捏了经典作品必备的跨时代特质——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坚守本心、守信向善的平凡个体，总能让不同阅历、不同背景的观众从照见自我。骡子那执拗、朴素的守约本心，源自乡土社会最原始本真的道德底色。这份道义并非革命赋予的外在标签，而是他接纳革命理想、追随红军道路的内在根基。作品以民间信义与革

近日，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入选剧目，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在北京演出。本次展演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该剧也是江西唯一入选展演剧目。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讲述了赣南客家青年马夫骡子，在湘江战役危急时刻，牢记红军托付，面对意外散落的巨额黄金不为所动，孤身突围、千里追寻红军的感人故事。该剧自2021年首演以来，演出百余场，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大奖提名剧目等多项大奖。好戏上演，我们再次回望骡子的长征——

编者

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古小姐，毕生所求便是“为主义献身”。憨厚耿直、行事坦荡的红军排长邱明亮，一路冲锋护佑、遇事挺身硬扛。还有唯利是图、贪财惜命的王火彪，是欲望直白外露的典型人物。而主角骡子个性鲜明，将信义诺言看得重于性命，明明可将金子转交邱明亮，只因许下“亲手交给二号首长”的承诺，便执意千里赴约、不惧艰险。剧中人物许多看似多余的周折，恰恰是独特性格催生的必然选择。极具辨识度的物人物人设，既强化了角色典型性，也不断制造戏剧冲突，多重性格碰撞交织，衍生出大量鲜活生动的喜剧桥段，因此亦可称作是一部“性格戏剧”。主创团队在宏大壮阔的长征迁徙背景下，克制住铺陈渲染的宏大叙事笔法，将契诃夫、老舍式的人间烟火幽默，与赣南采茶戏与生俱来的乡土诙谐巧妙融合，于细腻描摹中刻画凡人百态，再顺势转入大开大合的抒情段落，让渺小普通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拥有清晰的存在感，纵深层次与厚重分量。五个核心人物，为观众提供多重解读视角。站在



革命史维度，可窥见底层百姓追随革命、逐步觉醒的心路；站在传统文化维度，能读懂信义品格跨越岁月的永恒价值；站在个体生命维度，可看见平凡人在苦难磨砺中完成自我重塑的全过程。多重解读空间彼此共生，充分契合经典意识所倡导的阐释开放性。

近年戏曲行业内，不少作品照搬复刻标准化“采茶歌舞剧”模板，陷入套路化、同质化创作困境，也引来诸多业内质疑。事实上，这种固化模式并非该剧导演张曼君的创作初衷，反而是对其艺术理念的片面曲解。《一个人的长征》便是立足赣南采茶剧团自身现实条件，兼顾演员队伍基础、舞台技术配套，遵循戏曲内在审美准则，平衡舞台诗意自由与歌舞化尺度、纠治过度歌舞化弊病，为剧种未来发展探索新的可能性。回归戏剧本源，是激发艺术想象力的根本动力，舞台表现手法的丰富与创新，皆可依托这份原生想象力尽情延展。传统戏曲程式里的马鞭，早已不足以承载舞台细腻写意的美感，于是融入木偶、皮影、肢体形体演绎等多元表达，将生活化表

时代浪潮中的小人物精神史

——读欧阳娟的中短篇小说

□ 俞佩琳

在当代文学的小人物书写中，作家的视角常常游移于两极之间：或是俯身施以知识分子的悲悯，或是仰望托举出平民英雄的赞歌。欧阳娟的中短篇小说却提供了一种颇具新意的书写尝试——以平视的姿态，将小人物置于特定的文化变迁链条中考察其内在的精神肌理，让文化碎片、个人命运和时代场景产生多维的碰撞，使小说不仅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也有丰富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价值。

在互联网普及前，影视向信息闭塞的小镇青年单向地、高强度地输出了一整套港台文化所表征的“现代生活”与“成功人生”视觉模板，直接塑造了他们的“理想自我”。《隐身者》中沈焰冰的行为逻辑源自港台影视的剧本设定：忍辱负重、沉默付出为博妻子一笑；他的“别墅梦”并非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是许文强式的浪漫想象。《去街角》中的聂焰斌则直接将电影《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奉为人生模板，他的穿着风格、行为模式乃至“保护女人、讲究义气”的自我认知，皆是对港片黑帮英雄的模仿。《始于1986年的私奔》中帮姐无视现实的生活环境，始终渴望像言情片中的女主角那样被注

视和关切。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情感结构”是特定社群共享的、未系统化的鲜活经验与价值观。对于这一代人，港台影视输出出的“英雄主义”“浪漫想象”与“潇洒不羁”，深刻内化为他们感知世界、理解自我、进行人生选择的“情感结构”基石，参与其身份建构。当这套植入的文化想象与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剧烈冲撞，个体身份的撕裂与失语便成为必然。

欧阳娟通过“个体时空”与“社会时空”的拆解和编织，构建人物命运的张力场域。《隐身者》开篇的石英钟“走两步退两格”“徘徊在某日上午或晚上的九点二十五”，暗示人物凝固、错乱的私人时间。妻子柳珊对丈夫数日未归的迟钝反应，坚信“生活还按照他们想象的剧本在演出”的错觉，同样是个人时间感与社会时间脱轨的体现。沈焰冰的悲剧则在于，他试图以一套过时的“江湖浪漫”来应对日益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时间。《去街角》中，“打字”成为核心意象。曾靠拳头赢得一切的聂焰斌，面对智能手机时笨拙如“狗熊捉老鼠”，耗费半小时才能发出一句“丹丹回来了”。沟通工具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权力结构的

重塑，当社交方式从“喊一嗓子”转移到“打一个字”时，他的“英雄气概”便彻底失语。同样的，“街角的夜宵摊”在二十年前是他的“聚义厅”，二十年后却成了吴语林的“商务局”，众人只等吴语林表态后才蜂拥回应。小说还巧妙设置了“大奔”vs“挖土机”的对抗戏场，但结局却是聂焰斌被裹挟在“天与地的光闪之间”，这极具象征意味的结局宣告了个体试图以旧时空的逻辑闯入新时空的彻底失败。

相对于男性个体与时代语境的剧烈冲突，女性面临的则是社会环境的困守。《始于1986年的私奔》中其貌不扬、学历不高的表姐始终面临着来自家庭和传统观念的隐形的日常压迫与否定。她的婚姻由实用主义的妈妈和姨妈一手包办，表姐婚后向家人倾诉丈夫不会说话、不讲卫生，都被家人定性为“身在福中不知福”。她最后勇敢地与网友私奔，虽然被骗，但她似乎实现了某种内心的执念。表姐这没有自我表达能力的普通女性往往是沉默的符号，而小说让她们精神内核得以被清晰看见。《大明星》中县城普通家庭的女孩莫白羽想要成为“大明星”，但在面临着生活困境之后，母

亲指责她“痴心妄想”，认为正是这个理想导致她“落到这个地步”。她在北京漂泊五六年后，丈夫不再认可她的事业，将她的演出称为“深更半夜不知在哪儿鬼混”，并以离婚相威胁。她个子高，身材壮实全都成为周围人嘲笑、排挤的理由，最终，她未能实现“大明星”梦，但也没被这些压力彻底压垮。她回到家乡，以丧乐队领队的新身份找到了另一种价值实现方式，展现了女性在平凡中重新定义生命意义的过程。

一个好的故事要讲得有说服力，叙述的方式很重要，它决定了故事在伦理层面是不是站得住脚。欧阳娟始终保持一种克制的“平视”，书写小人物倔强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最后失败的悲哀。小说大量的“慢镜头”，关注柳珊的迟缓、沈焰冰的隐匿、聂焰斌的困扰与懊恼以及表姐的腹诽和抱怨，不评判他们，而是把这种状态理解为他们被困在了时间里了。小说也无意制造激烈的情节冲突来强调性别或者群体之间的观念差异，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表现彼此的模式与隔阂，这显然更加贴近真实。总而言之，欧阳娟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事手法为小人物书写增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作品探索。

（本文配图均为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剧照）



文艺观察

老区乡村振兴的诗意呈现

——简评范剑鸣诗歌

□ 汪 峰

如何锚定当下下山乡巨变，这是时代交给作家的任务。近年来范剑鸣的诗歌创作，重点聚焦了老区新三农的巨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经历，从脐橙、甘蔗等特色农作物的细微处入手，呈现出当下赣地老区乡村振兴的宏图画卷。

古朴而红色的乡村，既遥远又贴近。范剑鸣以沉稳有力的刻刀，呈现出赣南的原色，吸引读者的目光，唤醒人们乡愁情绪。如《地名志：石头坑》中，诗人通过一块石头展开铺排，“石头够大够结实”“压在大石头下的溪涧”“溪涧中漂着的枫叶”“盘旋着寻找小鸡的黑老鹰”“拆了又重建的小庙”“晃荡着书包回到家中”“青竹山寺烧火掌灯的独身男子”“种下大面积脐橙的异乡人”，此景只有赣南有，这武夷山下朴拙而厚重的村庄，让人流连在风景画中。还有《山岭上的歌》，客家人站在山岭中唱山歌，“岭上的白云，把山歌谱写在一条条神奇的横排上”“如果是杜鹃花/陡峭也是美丽的一部分”。还有《倾斜的山坡》“日出时，整座山岗是上升的/日落时开始西沉……/石头坑，丫叉坑，沙锣坑/大地褶皱，当山岗住满了橙子/群山又西斜几分”，作者还写有鸛鸛声等，这些被海德格尔称为“早已造就”的“故乡本己的东西”，是赣南乡村的原色和底色之一。故乡的慢镜头，正好可以慰藉当下世人空心化的乡愁。当然，赣南有“红色的炮台”，赣南的“地理志”中，有共和国喋血“乡愁”，红色也是这片土地上的底色原色。“一座山依然在它的纬度里……/仿佛一只滚烫的弹壳/清除了硝烟，火光，血迹，成为时针”（《水调歌头：井冈山》）“天地变得如此窄小/他躲在赣南的深山一角，抽完一支纸烟/开始编写一个国家的青史：油墨之黑/与一个修饰之辞相遇，就变成了红”（《在南方的群山中想起瞿秋白》），无数先烈的骨血留在了赣南这片壮烈的大地上。“悬头之树，城池已经陷落/那根系下的/坚固的地球，正好是另一颗/革命者的头颅”（《悬头之树》），只有革命者的鲜血才能让贫瘠的土地真正实现土壤改良，“我走过一条以红军来命名的大道/无数车灯，仿佛在大地上书写一篇新词”（《大地隐含着神秘的力量》），这片有着红色血脉的土地在新时代仍焕发出巨大的思想力量。

当脐橙等特色农业成为这片土地的新地标时，范剑鸣及时跟进并浓墨重彩地进行了书写。他将宏大的乡村振兴主题“微观化”，让一颗橙子折射时代变迁。从“漫过大地的橙花”到“奔跑的橙子”，从“第一枚果子”到“旺果期”，从一个“脐橙节”到“脐橙加工厂”，诗人以摄影师的精准镜头，追踪着一颗脐橙从开花到结果，从枝头到市场的完整生命过程。但这种追踪绝非枯燥的农事记录，而是赋予每一阶段以深刻的象征意蕴。当诗人写下“橙花又开放，美好的事情允许轮回/允许更美好”（《美好的事情允许轮回》），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对花果循环的感叹，更是对乡村振兴的笃信。当“传送带上，橙子们前赴后继”（《人们被命运逐渐分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水果的分级，更是当代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自我命运隐喻。范剑鸣的诗歌，还让具体的农事活动保持着形而上跃升的能力。如“燃烧，逼着地下的铜/慢慢升到树架”（《冶炼者》）“人间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开花/一个是结果”（《美好的事情允许轮回》）“万亩基地。一个新词，改变了旧词”（《世界只有伊甸园那么大》）“生命力并没有界限。哪怕仅存一枚旺果/浮出枝叶，也能像鲸鱼一样/安慰大海”（《旺果期》）“一粒糖。值得我们用十万块砖头/垒起厂房/值得我们在舌头上，满怀憧憬”（《注解：一种晶体》）。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回避乡村现代化转型期中出现的阵痛。在《筑场圃》中，“对不起，紫色的地毡。对不起/美丽的栀子花——童年的伙伴/转眼成为敌人”，这种对传统生态被改造的歉意，体现了诗人的反思。而在《每个人的克星都藏在自己身上》中，面对黄龙病不得不砍伐果树时，“他和铲子终于明白：有时候/果园的克星，其实并不是病虫/而是自己的软心肠”。当然乡村的空心化也深刻地刺痛诗人，“我总担心删除的枝叶/包含无辜。就像他谈起一个村子/锐减的人口”（《剪枝的人》）。因而这些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抒怀，抵达了更深的真实。

范剑鸣的诗歌还给当下新乡土诗创作留下了几点启示。

新时代的乡土诗必须回应时代之问，同时赋能乡村。这就需要诗人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辨明乡土的现状。乡村既有牛羊、鸛鸛声等原生态系统，还有山峦石头山排等千年的地标，又有割草机、绿皮卡、无人机、农产品加工厂等现代器物物和“土地流转”“精准扶贫”“电商直播”“消费助农”新词，乡村整体迈向工业化、数字化、城镇化“后乡土”的途中，词语在旧与新中，在乡村“亲近的本源”与日新月异的“巨变”中考验着诗人创作的能力和作品赋能乡村的能力。二是如何处理诗人与乡土的劳作。诗人曾为驻村干部，深度参与了乡间的劳作，写出了一批有温度的诗歌。诗人如能彻底从观者的身份置换为劳动者的身份，诗定会像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三是如何从政治学上升到哲学，始终是诗人的使命。正如诗人在《璀璨》中所写：“像太阳一样，一只甜蜜的橙子/在中国的大地上，被自身光芒转动”。

第264期

本版邮箱:1273023065@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695